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星座篇）

广交会

——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与发展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编

陈韩晖 吴哲 黄颖川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 [星座篇]

黄伟宗 / 总主编

1. 《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刘正刚 乔素玲 著)
2. 《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
(王元林 著)
3. 《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
(谭元亨 著)
4. 《侨乡三楼——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
(司徒尚纪 著)
5. 《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
(刘永连 谢汝校 著)
6. 《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
(周鑫 王潞 著)
7. 《海上敦煌——南海Ⅰ号及其他海上文物》
(崔勇 张永强 肖达顺 著)
8. 《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
(郑佩瑗 著)
9. 《香茶陶珠——广东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
(冯海波 著)
10. 《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与发展》
(陈韩晖 吴哲 黄颖川 著)



以广交会展馆为依托、以多龙争珠的珠江形象为文化底蕴，参加2009年庆祝建国60周年天安门游行的广东“领潮争先”彩车，是珠江文化研究会参与设计并题名的。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市中苏友好大厦开幕。图为商展会开幕盛况（商展会为广交会前身）。



1969年春季第25届广交会起义路展馆。



现流花路上的广交会原展馆，是原中苏友好大厦所在地，在1972年底动工，1974年3月竣工。

2008年10月，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琶洲展馆A、B、C区相继竣工，自此，广交会整体搬迁琶洲，完成了自1957年创办以来的第四次迁址。从第10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始，广交会全部移师琶洲展馆。





2000年第87届春季交易会开展当天，采购商和参展商们构成了万商云集的场面，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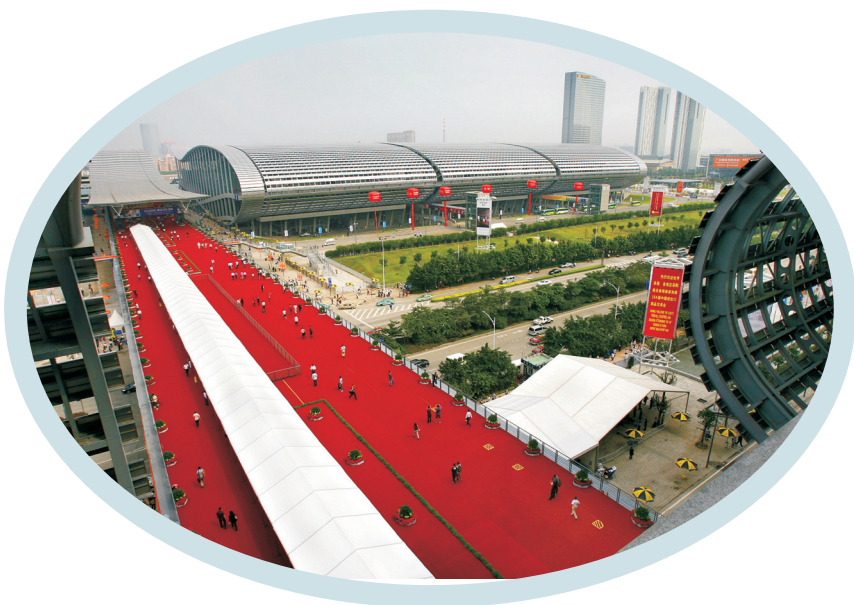


组团参展的外商在连接琶洲展馆A、B、C区的天桥上认真地听随团领队对展览场地的分布说明。面对总展览面积达111.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约5.5万个的展览场地，对任何一个参展商来说都是个识别方位的考验。





第100届广交会庆典晚会璀璨生辉的现场。



从第104届开始，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建立了“宏观指导、地方组团、行业协调、专业办展”的新型运作机制，并分三期举办，总展览面积达111.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约5.5万个，参展企业2.2万家。新展馆、新展期、新机遇正在成就广交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新跨越。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星座篇）

Guang Jiao Hui

广交会

——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与发展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室）编
陈韩晖 吴哲 黄颖川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与发展 /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研究馆) 编；陈韩晖，吴哲，黄颖川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 10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星座篇)

ISBN 978 - 7 - 5454 - 4216 - 8

I. ①广… II. ①广… ②陈… ③吴… ④黄… III. ①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 - 研究 IV. ①F7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908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 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本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9.5 2 插页
字数	200 000 字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454 - 4216 - 8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 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510075

邮购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 37601980 营销网址：<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编撰组织成员名单

总组委会

主任：徐少华

副主任：李贻伟 张小兰 周 义

总编委会

主任：张小兰 周 义

副主任：黄 尤 麦淑萍 彭 赞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培楠 王肇文 卢锡铭 乔建葆 周克元 洪三泰

索建元 黄森章 梁桂全 甄伟钢 蔡高声

学术委员会

主任：黄伟宗

副主任：司徒尚纪 谭元亨

委员：张 磊 陈永正 田 丰 徐远通 侯月祥 顾润清

叶春生 黄启臣 曾 骥 韩 强 章文钦 张其凡

杨兴锋 郑楚宣 吴松营 陈海烈 李庆新 王元林

刘正刚

编辑部

总主编：黄伟宗

副总主编：王培楠 司徒尚纪 谭元亨

总主编助理：郑佩璵

编辑部成员：张 涛 曾 韬 王鹏程 谭 劲 莫羨春

钟振宇 庄福伍

执行编辑：赵韶沁 李海春 张琰琰 符文申 黄莹莹 郑旭东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

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组 编

总 序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周 義

为响应中央关于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号召，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及其所属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作出了《广东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工程研究系列项目》的策划，以陆续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带动这项系列项目工程的进行，是很好的，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央要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项工程，就应当是全方位开放并多层面共举的建设工程。

从研究开发对象的性质上看。海上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我国与海外诸国交往的交通线路，它以商贸往来为主，但又具有外交、军事、文化等性质；它主要是我国与海外诸国相互经济来往性质，又有和平亲善的民间友好往来意义；这就是其全方位、多层面之所在，从而对其研究开发，就应当从这些诸多方位或层面去进行，才是全方位、多层面开放共举的研究开发。

从研究开发的内涵与空间上看。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工程，顾名思义，自然应以研究开发当今现状和今后发展为重、为主，但也不能离开古代文化遗存及其发展源流的研究开发；丝绸之路有海上与陆上(含边境、草原)丝路之分，以及海陆丝路之间的对接通道的研究开发；在丝绸之路中又有多种类别之路，诸如宗教、华侨华人、学术、科技、教育、文化、海洋、渔业、农业、特产、工艺等行业领域的海外交流之路，以及海上丝路的港口、线路、地

域（省内外、海内外）的古今研究开发，都是具有全方位和多层面研究开发的内涵与空间，并且都是可将这些方位或层面以开放并举的举措去进行的。

从研究开发的途径和方式上看。对这项工程（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的进行，也应当采取全面开放并多层面并举的方针，即软件开发与硬件开发、方案策划与方案实施、理论与实践总结、文案研究与实地考察、考察发现与媒体宣传，以及研究中多学科的立体交叉、宣传中的多方式多渠道、开发中的实体工程与形象工程等，都是应当相互交叉同步进行，同时又是以全方位开放并多层共举的途径和方式进行的。

从研究开发的结果上看。这项工程应当既有逐步成果，又有总体成果，即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的途径和方式，是全方位并多层面共举，同时又相互交叉同步进行，从而势必在进程中产生每步的成果，同时又会在每步成果中出现全方位、多层面的诸多成果，最后在总体上产生出包含各步诸多成果在内，而又是“更上一层楼”的全方位开放并多层面共举的总成果。

以这样的理念指导、进行和完成的项目工程，必将不仅是取得项目成果的工程，而且是在进行的理念、途径和方式及其取得成果的模式上，都是比一般单项工程更丰富多彩而综合使用价值更高更大的工程。这样的工程及其成果，才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中，持续发挥出增强广东省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

是为序。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提案委主任，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主任（馆长）]

前 言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十大文化“星座”的 发现和实证过程

黄伟宗

现在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第二辑[星座篇]，是广东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系列项目的组成部分，包括10部分册，即《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海上敦煌——南海I号及其他海上文物》《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的曲折外贸之路》《侨乡三楼——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香茶陶珠——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和发展》。每部分册都是某个时期或某个种类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主要标志或群体研究的介绍著作，因这些主要标志或某类群体，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某个时期或某门类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光辉，故称之为“星座”（或称“星群”，下同。因为一个“星座”中有其包含的“星群”，而同类的“星群”亦可共称为一个“星座”）。所以，“星座篇”所含的10部分册，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十大文化“星座”的研究和介绍专著。

这十大文化“星座”，是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和珠江文化研究会（下称“我组我会”）的多学科专家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党组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进行珠江文化研究的同时，研

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迄今达20余年的进程中，逐步发现和实证出来的。向广大读者介绍这些“星座”的发现和实证过程，增进其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是有所裨益的事。

（一）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早在1993年夏天，我偕同省参事室文化组参事，到封开和梧州考察，发现这个地方原是西汉时的“广信”县，是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以汉武帝平定南越的圣谕“初开粤地，广布恩信”而取名，并在此设置统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后人简称“广信首府”，并由此界分广东、广西），且由此发祥广府文化、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同时，又从《汉书·地理志》中的一段记载得知：汉武帝也在这个时候，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徐闻、合浦赴日南（今越南）出海外多国。这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字记载。但是从未有学者到徐闻实证这个记载。

2000年6月上旬，正当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我等一行冒着酷暑，到达徐闻县西南沿海土旺村（与徐闻古县治“讨网”音近），在二桥、仕尾一带，发现汉代板瓦、筒瓦、戳印纹陶片，以及汉墓、桔井口、烽火台等遗存，综合之前考古学者在此发现的汉代“万岁”瓦当、水晶珠、银饰、陶罐等文物，以及《汉书·地理志》中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等记载，与田野考察实证与史料记载结合判断，这即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旧址。我随即写出省政府参事建议《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该建议受到省领导高度重视，即批准成立以黄伟宗参事为首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负责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这项发现和实证成果，意味着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团在泉州确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宋的始发时间，推前到西汉，从而具有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1300年的意义。

2001年11月下旬，项目组在湛江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

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西、海南、厦门、泉州、香港、澳门等地百余名专家们，再次证实和认同了我们的发现和实证，从而确认西汉徐闻古港是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星座”，同时发现和实证的合浦、雷州、遂溪等古港同是这“星座”的星群。

（二）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

从2001年至2003年，项目组同仁先后到南海沿岸的南岸、拓林、凤岭、樟林、白沙、大星尖、南澳、广州、香港、澳门、台山、阳江、电白、遂溪、雷州、徐闻、合浦、北海、钦州、防城等古港，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漠阳江、鉴江、南流江、北流江等出海港口，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每个古港都有一段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而且在历史上呈现此盛彼衰的现象，但又在总体上形成了从汉代至清代都不间断地有繁荣古港的形势和格局。由此说明，广东自古以来都有不间断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在每个历史年代都有兴旺的古港和历史，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最完整的实地见证和体现，从而可见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而完整、港口最多而辉煌的海洋大省。所以，这一系列南海港群，是广东海上丝路由一批星群共现的文化“星座”。

（三）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在先后考察贯通湘桂至古广信（封开）的潇贺古道，以及南雄梅关珠玑巷时，已对海上与陆上丝路之间对接现象有所觉察，但真正意识到其重大意义则是本世纪初对这两条古道的再次考察。这两条古道的遗址和史料，都证实其本身从来就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功能和意义。前者在《汉书·地理志》中已写明，汉武帝派黄门译长开创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水陆联运的潇水至贺江古道到广信，然后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徐闻而出海的。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么？南雄梅

关古道是唐代贤相张九龄主持开通的。他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明了其目的，是为沟通中原与海外的贸易和往来。与梅关相连的珠玑古巷，是唐宋以来中原南下移民岭南以至海外的中转站，致世界广府人皆认其为“吾家故乡”，可见梅关珠玑巷在历史上起到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南雄乌迳古道、乳源西京古道、连州南天门古道，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等水道及其相应的水陆通道，遍布全省，可见水陆古道是广东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所以也是由诸多海陆丝路古道星群共现的一大文化“星座”。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最近我们到梅州市考察，在大埔发现晋代开拓连接闽粤的梅磜古道的同时，在梅县松口发现了“南洋古道”。因为这里建有中国内地唯一的“世界移民广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发起的旨在纪念海外华人的“印度洋之路”项目，并先后在马达加斯加的多菲内、留尼旺的圣保罗、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岛、科摩罗的马约特、印度的本地治里等地建设了同样的移民广场，在梅县松口建“广场”，是为了纪念19—20世纪离开中国前往印度洋群岛的中国人，同时，松口也是客家人“扬帆出海，开拓进取”的始发地，客家华侨的回归地，又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和印度洋国家人民之间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中枢地，所以，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印度洋之路第一港”，既是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又是江海对接的通道。

（四）“海上敦煌”——南海 I 号及其他海上文物

阳江南海 I 号宋代沉船，从发现、出水到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安放，历时十年有余，自始至终都是世界性的新闻大事，因为这条沉船，是迄今世界海上出水历史文物中，历史最早、体积最大、文物最多、保存最好、价值最高的文化遗存。由于其是从事中外贸易的商运货船，因此具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性质；而且其文物以瓷器为主，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陶瓷之路”的特点；尤其是以往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多是海岸文物，海中实物甚少。所以，2003年9月项目组对其考察时，我为其作了“海上敦煌在阳江”的题词。

从此，南海Ⅰ号有了“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和代号。我作此定位的依据是：陆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最多的是甘肃敦煌，约有6万件，故甘肃敦煌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而阳江南海Ⅰ号沉船中的文物，估计有6万~8万件之多，又是具有海上出水文物的“五最”优势，堪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故称“海上敦煌”。由于当时《阳江日报》报道南海Ⅰ号是“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并在网上传播，被正在中山大学举办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培训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知道了，便托人找我引领，于2004年元旦前往阳江考察。当他们认真观看了南海Ⅰ号少量出水文物和听取介绍之后，当即表示“世界少有”，并认同“海上敦煌”的定位。2004年5月，著名的海洋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台湾“教育部长”兼成功大学校长吴京教授知悉并打电话到中大，请我邀请他来考察南海Ⅰ号，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我陪他到阳江考察。结果他对南海Ⅰ号的评价更高，认为“世界海洋史要由此改写”；接着他在中山大学对研究生作报告时又讲到，南海Ⅰ号与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高峰。所以这无疑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大“星座”。稍后发现和出水的南澳县“南澳Ⅰ号”明代沉船，也有相近的文化遗存和影响，应当属这一同类“星座”。

（五）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

2000年6月，项目组到韶关曲江南华禅寺考察。南华禅寺是东晋时期印度和尚智药三藏兴建的，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认南华禅寺为“祖庭”，并自建“分庭”，尤其是禅宗六祖惠能在南华禅寺弘扬禅宗文化，将外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其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禅宗佛教“真正的创始人”，被世界媒体称为“东方三圣人”“世界千年十大思想家”之一。南华禅寺的创建及其世界各地的“分庭”，以及六祖惠能的世界影响，都经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的“西来初地”，是东晋时印度佛教禅宗和尚达摩，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的登岸地。达摩是中国禅宗教派始祖，由此其登岸地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

是“佛教传播之路”。稍后在肇庆考察时，发现明代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此传入天主教的同时也传入西方现代文明，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传进西方，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接着又在广州的石室教堂见到基督教从西方传入的史迹，从而感悟到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在广州的怀圣寺见到伊斯兰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史迹，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伊斯兰教传播之路。在广州的光孝寺、六榕寺和新兴的国恩寺，还看到佛教传入传出的国外的记载，以及在广州参加过出海祭神的南海神庙庙会，在各地见到拜祭“海神”的妈祖庙、天后庙和“江神”龙母庙等，使我更深更广地感悟到海上丝绸之路也即是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进而感到这些从海上传遍岭南各地的宗教信仰文化有似“沧海航灯”般的文化星群，自然也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文化“星座”。

（六）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的曲折外贸之路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最大的商帮——粤帮的统称，又近似明清时代“海关”，是清乾隆至同治年间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并具海关职能的口岸，历时300余年，直至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结束。在其兴旺时期，全世界50多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分号或代办机构，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则更多。所以，十三行实则是清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和标志，是海上丝路即外贸之路的典型，很有历史文化意义。近十年来我和项目组的多位同仁，为发掘其文化遗存都多次撰写过调研报告和参事建议，以及历史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作品。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路文化一大“星座”，其星群遍布世界五大洲。

（七）开平碉楼、侨墟楼、排屋楼——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

海外华侨华人和侨乡文化，实质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种产物和体现，因为出海回归、联络交流，都必经海上丝路，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即是

华侨华人之路。自2006年以来，项目组一直关注华侨和侨乡文化现象，多次到江门、开平、台山、恩平、鹤山、新会、蓬江、东莞，以及潮州、汕头、汕尾等地考察，先后发现并提出“广侨文化”“客侨文化”“潮侨文化”等文化现象和文化定位，受到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尤其是2006—2011年，项目组先后到开平考察，发现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和台山的“侨墟楼”，以及东莞凤岗的“排屋楼”，都具有见证海上丝路文化即华侨华人文化的典型代表意义。因为这三种文化，都是华侨华人文化与广东三大民系（广府、客家、潮汕）文化交叉融合的文化形态；而这三种“楼”，则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实体体现，并且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和载体。特别是“侨墟楼”，它是侨乡中墟集商市的总称，因其既是传统农村墟集，又是华侨投资所建的“楼”，并有与海外通商的码头和商行，具有自十三行统管海外通商结束后，所出现的中国海外通商在侨乡遍地开花的转型意义，所以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侨乡泛化的体现。此外，潮汕地区的“红头船”和“侨批”等现象，以及珠海在近代出现的容闳所开拓的“西学东渐”和中国留学生之路，也都是华侨华人文化即海上丝路文化的实证，是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和星群。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文化“星座”。

（八）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

位于广州西关的锦纶会馆旧址是清代建筑，它是广东最早的丝绸行会成立地，也是广东丝绸行业历史变迁和海外丝绸贸易兴衰发展状况的见证。如果说这座历史文物是广东丝绸业“前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广东丝绸业“今生”的文化载体则非广东丝绸集团莫属。所以，可以“古锦”和“今丝”四字而喻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广东丝绸集团总公司及其所代表的南方丝绸行业，是项目组自成立以来一直合作的伙伴，既共同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又考究南方古今丝绸生产和贸易发展之路，从中发现广东的丝绸生产与贸易早在清代已位于全国前列，珠三角以桑基鱼塘围海造田繁殖丝绸生产，陈启

源最早创办现代机械缫丝厂，“广丝”（尤其是香云纱）“广绣”风靡海内外，可谓“今丝”品牌，一直古今不衰，改革开放后更是蓬勃发展。据该公司统计，迄今已行销海外181个国家和地区，可见丝绸贸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干之一。所以，这也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又一大文化“星座”，其星群遍布海内外。

（九）莞香、茶叶、陶瓷、南珠——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

东莞自古是著名的香料生产贸易之乡，所产香料多为沉香，因其质特优，被誉名“莞香”，“女儿香”是其最名贵的品种和代表。据刘丹《女儿香》描写：“女儿香”乃东莞地道著名土特产，亦为东莞最负盛名之皇家贡品，又是畅销海内外的特产商品。史载：明末清初盛景年间，“岁售逾数万金……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常常一艘艘载满莞香的货船从东莞运至香港，使莞香成为和茶叶、陶瓷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也使得转销莞香至海外的港口冠名“香港”；近年我们先后到东莞寮步、大岭山考察，仍可见到售香赏香如潮的“香市”景象，此可谓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香料之路的根由。

其实，海上丝路主要是运销土特产至海外，同时又运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到中国，互通有无，古今如此。广东的出口特产或高新尖产品很多，如佛山陶瓷、潮汕茶叶、英德红茶、肇庆端砚、湛江南珠、怀集金燕，以及当今东莞制造业产品、云浮石材产品等，都是行销世界的商品。所以，海上丝路即是茶叶、陶瓷、珍珠、燕窝等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尤其是最新的制造业、物流业、运输业、科技业等进出口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对广东来说这些都是特别兴旺发达的，也是星群特多特大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星座”。

（十）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广州创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

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可谓海上丝绸之路之新生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渠道，有“中国第一展”之称，20世纪80年代后“广交会”取得巨大发展。迄今“广交会”已成功举办116届，而且从开始的“出口商品交易”，发展为现在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交易面和交易额均与时俱增、俱进，带动了会展业在广东的飞速发展，如影响世界的深圳“高交会”“文博会”等，都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一大文化“星座”和不断持续发展的星群。

以上是迄今我组我会发现和实证出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十大文化“星座”。正如宇宙太空的星座星群尚需不断发现那样，我们将再接再厉，持续努力发现和实证出更多更大的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文化“星座”星群。

应当特别郑重地指出的是：我们所称之“发现”，是因为这些“星座”的文化景点或旧址虽然早已存在，人们也很熟悉它，但尚未有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上，去认识和发掘它的文化内涵和作出文化定位，而我们则是首先这样做，故以“发现”谓之。所谓“实证”，是实地考察证实之意。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与文案研究相辅相成的。这十大“星座”都是我组我会多学科专家教授20余年来，结合文案研究进行实地考察而逐步发现和实证出来的。显然，这样做虽然实实在在，并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毕竟学术提炼的火候不足，匆促、感性、粗糙的缺陷难免。正因为如此，在制定《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工程项目规划》中，我们特地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项目，弥补以往的不足，尤其是特地组织[星座篇]的写作，将以往发现、实证的成果进行学术深化。

[星座篇]10部分册的作者，多数是从当年起步时即参加考察过程的专家教授，部分后起之秀，也是对其所写专题比较熟悉的学者或记者。从总体上说，他们都是对我组我会学术团队20余年考察发现实证成果的深化，是体现当今各个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是海上丝绸之路理论建设的学术系列专

著。另外，我们考虑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当向广大群众和外国朋友做宣传普及工作，使他们对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也力求每部书都图文并茂，尽量选用原始照片和引用原始资料，力求通俗易懂，并兼备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最后，我想借[星座篇]出版的机会向相关部门提些建议，仅供参考：

1. 建议省有关部门和上述“星座”所在地区或单位，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和需要出发，以古为今用、中洋并用的方针，继续深入研究、深入开发、深入宣传，尽力争取将其列入世界物质或非物质、生态或记忆的文化遗存或遗产，千方百计地使这些“星座”永远持续地迸发出更大的光芒。

2. 继续扩大发掘更新更大的“星座”及星群，如科技、海洋、渔业、水利、水运、农业、林业、工业、文化、文艺、教育等领域，从古至今都有与海外诸国交往的历史和实绩，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遗存和实绩，这些都是海上丝路文化的“星座”或星群，应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发扬光大。

3. 加大力度全方位地研究宣传海上丝路“星座”及星群，可以将现已发现的十大“星座”，编列出版研究书系，制作电视系列片，创作美术、摄影、散文、诗歌、音乐等门类的系列作品，以及邮票、明信片等。各行业、各领域新发现的“星座”及星群也可以这样做。而且，都可以将这些系列著作或作品，制成外售商品或对外交往的信物或礼品，作为我省的“名片”“品牌”打造，既是文化创造，又是扩大宣传，也即是持续开拓海上丝绸之路。

（本文作者为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聘参事、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广东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家智库成员、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学术委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化学者。）

序言

◎ 王培楠
丝路明珠广交会的前世今生

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年。

甲午马年花城广州的春天，脚步匆匆，几番风雨之后，似红云燃烧的红棉树就青绿一片了。就在这绿色葱茏之中，第11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如期在广州开幕。

在这万商云集的日子里，广交会所在的琶洲展馆如同一艘停靠在珠江岸边的现代巨大航船，人流物流穿梭般进出，盛况空前。

琶洲岛是黄埔古港旧地。黄埔古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琶洲塔就是当时船只进出的航标。眼前景物在“时间隧道”里与秦汉年间切换，真是星移斗转，不知今夕是何年。如今的广交会，每届到会的中外客商20万人，成交额300多亿美元。广交会真正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经济贸易往来的“黄金通道”“商贸桥梁”。

当人和事的前世今生，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交汇，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历史沉思。展望正在筹划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的中国，站立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广东，再次亲临其境感受广交会的空前盛况，蓦然惊醒，今年是甲午马年！

此刻，我们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历史，一曲悲亢的甲午殇思动人心魄。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让中国人民心头的伤口依然滴着鲜血。

正是这场战争，使得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帝国列强践踏下的清王朝更加衰微破败。时年，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但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就有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另加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一亿多日元。从此，这个辉煌时期财富曾经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封建帝国，就在风雨飘摇中轰然崩塌了。

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图强变局的梦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但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甚至对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个甲子过去了。

当今世界，又一次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将往何处去？这样的追问，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思考，同样也为世界所注目。因为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进出口第一贸易大国，其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正在追赶美国。一个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中国梦”，清晰浮现。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呼唤着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大战略”横空出世。

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中国，在经受长期被压迫、被侵略的屈辱岁月后，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民族复兴。中国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引发了各方利益的博弈与纠缠。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不但要很好地向本国民众阐述好“中国梦”的魅力与内涵，更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梦”的实现，同样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在这历史性的大变局中，中国宣传并实行的和平崛起，将是国家战略的核心。

就在这甲午马年的春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清晰地表明，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之路。习主席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睡狮醒了！面对世界，这个屹立在地球东方的大国提出了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这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也是共同造福于世界人们的中国责任与担当。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中国秦汉以来，同各国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一条“和平崛起之路”，无论是陆路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曾经给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幸福与财富。这与武力枪炮打开的殖民统治是截然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高扬丝绸之路的旗帜，就成为中国对外的一张最亮丽的名片。再借丝绸之路，实现大国崛起，是中国当下最好的战略选择。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利希霍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和洛阳，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在利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它同样也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丝绸之路改变了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形态，促进了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得以在世界传播并在更广泛的领域运用，促进了世界的科技与工业发展。

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人口众多，粮食非常重要，而番薯的引进并大量种植，对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还有唐末五代时期由东南亚传入福建的占城稻，后来成为长江流域占主导地位的粮食作物。有农业专家认为，占城稻不但对中国长江流域稻作系统产生过深远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远达日本，在日本形成有名的“稻作文化”。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还引进玉米、花生、番茄、烟草、茉莉花、木棉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今天宣传丝绸之路，就是要很好地唤醒世界对历史的美好记忆，使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的新路径。

当我们谈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聚焦在一个重要的坐标上，那就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的重要门户——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广交会孕育诞生并成长于广东，并不是偶然的。广东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跑者”。就是在丝绸之路的开辟上，广东也曾经“领先中国”。

张骞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历史记载，他自请出使西域，历经13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是中原去西域诸国的第一人。

张骞走到西域时，发现大夏商人就已经在销售四川的丝绸、竹杖、枸酱等，他感到很奇怪，就汇报给汉武帝。汉武帝层层追问，最后得知，“道西北牂牁江，汇广数里，出番禺城下”。也就是说，这些货物是经江河到番禺，再由番禺下海，辗转到达印度，并销往大秦（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大帝国是当时世界的两大中心，而丝绸之路就是这两大中心联系的重要纽带。这个故事表明，在汉武帝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之前，民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就已经开通了。正是汉武帝听取了关于蜀货南运出海的陈述后，才毅然决定派人自广东徐闻、合浦起航出海。这就是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首航的第一批官方船队，规模巨大，并第一次写入了史书之中。

广东人自古以来就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智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尽管各个朝代多次海禁，但广州港从头到尾都没有禁闭过。因此，“广交会”孕育诞生并成长于广东，就是历史之必然了。

时值甲午马年春，第11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隆重开幕。20万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中外客商云集广州，其场面之热烈、其气象之鼎盛，令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举办两届，经历了风风雨雨，已经在广州成功地举办了整整115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有人说，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里程碑”；有人说，“广交会”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经济贸易往来的“黄金通道”“商贸桥梁”；在当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中，广交会更被称之为“海上丝路新驿站”。

俗语说：“鉴往知来。”当我们翻开广交会的历史资料，寻觅广交会的发展足迹，那作为“里程碑”一连串的数字，就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

1949年，在地球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轮耀目的太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诞生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但当时有一股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势力，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企图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扼杀新生的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切地需要寻找适合中国实际、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的新渠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于是，一项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诞生了。

1957年春天，刚刚送走料峭春寒的广州城，红棉花开得倍加鲜艳。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几经曲折，终于在祖国的“南大门”隆重举行。尽管这一届广交会，到会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9个，客商1223人，出口成交额仅为1754万美元，但它却有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世界。它表明：中国是封锁不住的。自由的经济贸易往来乃是世界各国经济互通有无、互相依存、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即使是处于受遏制、受包围环境之中的中国，也仍然顽强地向世界敞开自己的贸易大门。从此，中国透过广交会这个“黄金贸易通道”，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妨随意抽出第20届、第40届、第60届“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数字，来看广交会这个“晴雨表”的意义。

1966年第20届广交会，到会的国家和地区52个，客商总数6329人，出口成交额为4.8亿美元；

1976年第40届广交会，到会的国家和地区92个，客商总数13326人，出口成交额为15.88亿美元；

1986年第60届广交会，到会的国家和地区96个，客商总数31617人，出口成交额为40.88亿美元；

进入90年代中期，参加广交会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每届参会客商至少5万人，每届出口成交额近百亿美元甚至超百亿美元。

透过这些记录，我们惊喜地发现，即使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广交会也仍然是届届如期举行，从未中断。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一旦打开开放的大门，就再也不能关上，是潮流就得奔涌，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也许有人会说，当今的中国早已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从沿海到内

地，从东部到西部，从省会城市到地级城市，甚至到县级城镇，一个个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常年地不间断地相继召开，那么，广交会还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来搞吗？

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实践来看，我们既需要“满天星斗”，但更需要“一轮明月”。这是因为：

首先，广交会作为我国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盛会，在我国年出口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据2013年春秋两届广交会的统计，出口贸易额依然高达672.3亿美元。

其次，透过广交会这个中国国家级的贸易盛会，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名优特新产品的最新发展。广交会已成为我国名优产品进入世界市场集中登台亮相的最好贸易“橱窗”。

最后，对我国外贸企业而言，每年两届的广交会还是一个观测世界贸易新走向的“风向标”、制止恶性价格大战的“灭衡器”，以及寻找差距、奋发向上的“加油站”。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国正在努力追求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在参加广交会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笔者请一位外商发表观感，他幽默地反问道：“你想想，在这个地球上做生意，假如缺了中国13亿人口这个大市场，那会变得怎么样？”

是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经济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际大市场。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既可以从世界经济繁荣中获益，又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着巨大的市场，为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据统计，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4.16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货物贸易最大的国家。面对中国的投资与消费潜力，任何试图唱衰中国的论调，都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有专家认为，中国的GDP规模已突破8.3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按照7%~7.5%的速度增长，其绝对增量也在0.6万亿美元左右。巨量的GDP规模必然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放眼全球市场，这对外商的投资贸易而言，显然是不可错过的机遇。因此，我们有理由满怀信心

地期盼着，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会建立起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世界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怀着鉴往知来的心态，翻开了广交会那一页页依然滚热鲜活的历史档案，一种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波涛在心中澎湃。我们热切期盼着，广交会将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驿站。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借新的丝绸之路而倍增光彩！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副总编辑）

目录

第一章 贸易大国的辉煌与挑战

第一节 57载广交会 书写中国外经贸传奇/6

第二节 广交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11

第二章 统制专营时代下的初试啼声（1957—1978年）

第一节 出口商品展览会“试水”成功/21

第二节 广交会对我国对外贸易渠道的影响/24

第三节 经济困难时期货源不断/26

第四节 国民经济复苏 新产品琳琅满目/29

第五节 “文革”期间负重前行/32

第六节 中美联合公报引发“中国热”/36

第三章 市场化方向的初步探索（1979—1987年）

第一节 外贸体制开始对接市场经济/46

第二节 “官商”作风凸显转轨之痛/50

第三节 承包经营扭转“打乱仗”局面/53

第四章 深化改革的整体推进（1988—2001年）

第一节 全年出口成交首破百亿美元/63

第二节 广交会“断奶” 步入多元发展/67

第三节 南方谈话开启外贸体制改革/69

第四节 放宽准入 私营生产企业破冰/71

第五章 开放型经济对接国际规则（2002—2007年）

第一节 中国“入世” 广交会迎来新起点/80

第二节 时间换空间 一届办两期/81

第三节 “非典”免疫保卫战/84

第四节 由出口变进出口 进出口双向平衡发展/88

第五节 琶洲展馆扩容 广交会跃居世界第一展/91

第六章 在国际金融危机洗礼中新生（2008年至今）

第一节 金融危机寒流中 外贸企业奋力突围/102

第二节 转型主旋律突进 刷新外贸版图/106

第三节 广交会推电商终端 打造永不落幕的展会/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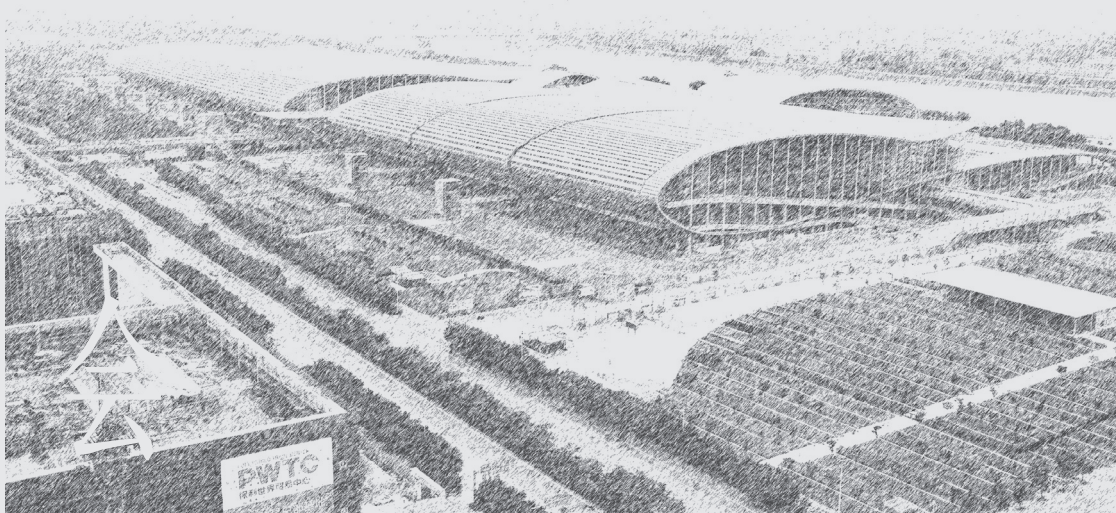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助力中国外贸首破4万亿/116

参考文献/122

后记/123

第一章

贸易大国的辉煌与挑战



2013年注定会成为中国外贸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关口；与此同时，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这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表示。

中国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的“三级跳”，仅仅花了10年时间。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刚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突破3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增长不足3%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发展再次迈上了一个万亿元级的新台阶，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上升。

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则可以追溯到另一个不平凡的日子——1978年7月30日，濒临破产的香港商人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碎片，乘车穿越连绵的绿色原野，来到广东东莞虎门镇，创办了太平手袋厂。由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号”就这样正式诞生了。

历史的魅力在于，许多不经意的举动竟因历史的点拨，而成滚滚大潮的起点。谁曾想，从太平手袋厂生产线上下来的手袋，拉链轻轻拉开，竟然拉开了此后30多年波峰竞逐的中国制造大潮，成为中国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现如今，整个中华大地成了忙碌的世界工厂，这里工厂林立，道路和桥梁四通八达，码头和机场异常忙碌，数不清的集装箱络绎不绝地从这里启程输往各地，“中国制造”的身影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世界各重大商业展会上穿梭着中国商人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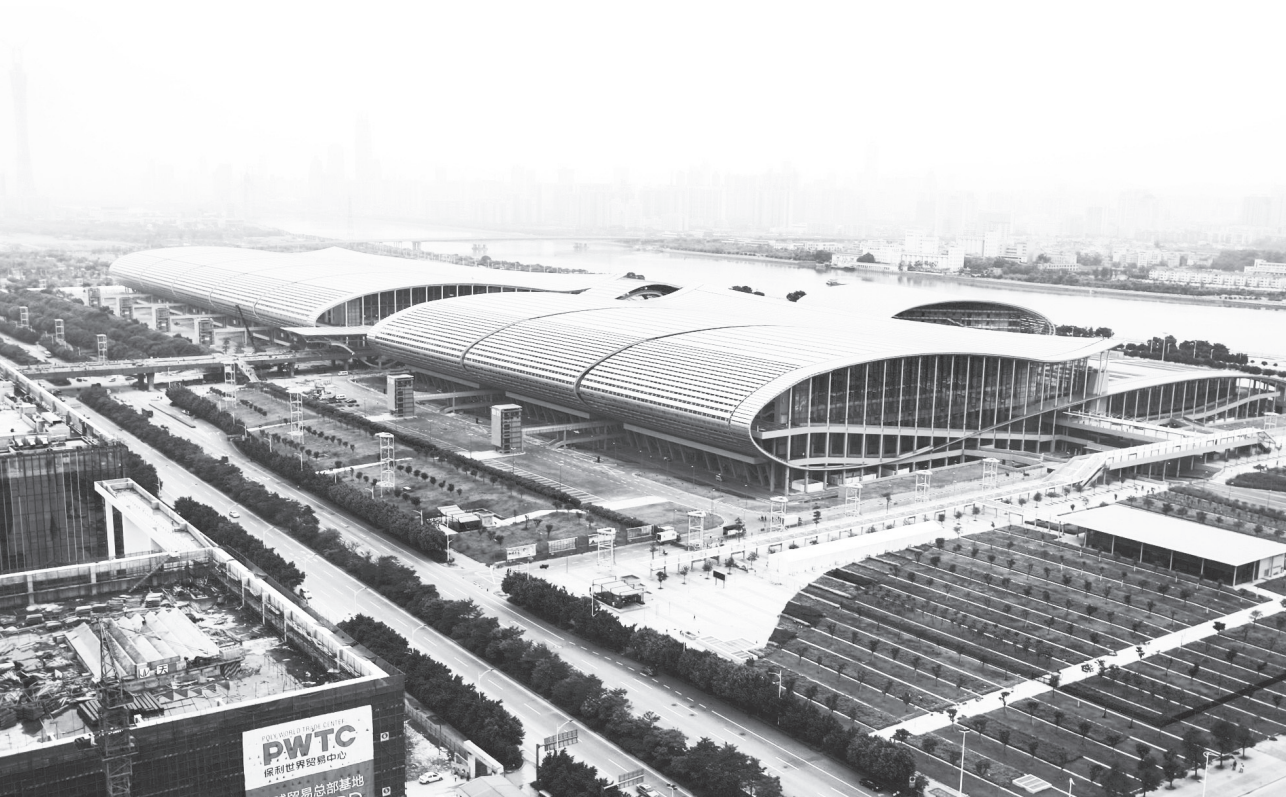
而从最初的9600平方米、1223名客商，到现在的117万平方米、近20万名客商，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一展”的广交会，以其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等特点，伴随着中国外贸一路发展壮大。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推动对外贸易不断迈上新台阶。

1978年7月30日，濒临破产的香港商人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碎片，乘车穿越连绵的绿色原野，来到广东东莞虎门镇，创办了太平手袋厂。由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号”就这样正式诞生了。（杨凯摄）



2008年10月，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琶洲展馆A、B、C区相继竣工，自此广交会整体搬迁琶洲，完成了自1957年创办以来的第四次迁址。从第10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始，广交会全部移师琶洲展馆。（吴伟洪摄）



阶。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4%，几乎每4年翻一番。现在中国每两天的贸易额，就超过1978年全年。

与此同时，外贸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18%左右，直接和间接带动国内1.8亿人就业，创造了18%的全国税收。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与贸易伙伴在经济上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全球化深入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世贸组织2013年发布的数据，在159个世贸组织成员国中，中国是107个成员国的前三大进口来源地，也是42个成员国的前三大出口市场，还是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在全球许多国家，“中国需求”带动了当地经济繁荣，创造了众多就业岗位，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中国外贸发展仍面临不少瓶颈制约，建设贸易强国任重道远。

无论是广为流传的“零售价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工厂仅得1美元”，还是“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的说法，均折射出一个尴尬的事实：中国出口产品普遍附加值较低，拥有自主品牌较少，研发和营销等环节还比较落后，出口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危险。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内经济曾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境，面临着金融、投资、财税、外贸等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难题；曾遭遇“非典”来袭的压力，也要应对“入世”后枪手如林、贸易条件恶化的挑战；曾经历石油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海湾战争、“9·11”事件等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又要抗击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冲击、经历自身产业结构调整阵痛的阵痛……

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歌猛进式的快速发展之后，从2012年开始，中国外贸发展步入个位数低速增长的阶段。除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这一客观因素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与中国自身主动为之的调结构、转方式的行为相关。实践证明，增速虽然放缓，但中国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正有所改善，呈现出贸易伙伴趋向多元、贸易区域更趋协调、外贸主体结构更趋合理、进出口商品



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伙伴分布示意图。

结构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的可喜变化；而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回落，对外需依赖程度的减弱，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积极推动重塑全球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间的竞争和贸易摩擦还会进一步加剧。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世界经济的回暖、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的好转，我国的出口需求将有效改善；另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了新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将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我国经济全方位开放的优势，推动外贸进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将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东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这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中国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面貌走向世界。

第一节 57载广交会 书写中国外经贸传奇

2014年5月5日，第115届广交会在广州琶洲展馆落下帷幕。

作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人们已经习惯于到广交会上去寻找中国外贸未来的答案，一探世界经济形势的体温。

从广交会上境外采购商的变化，我们发现，新兴市场的购买力正在不断增强，而传统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在缓慢复苏。

从广交会上成交订单的变化，我们可以读出市场和采购商的心态越来越谨慎和挑剔，也能感受到国际竞争环境的日益激烈。从广交会上参展企业的表现，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广交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是展示中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是培育外贸人才的摇篮，是扶持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助推器”，更是展示出口品牌商品的示范基地。它集中了中国最优质的外贸企业，在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展会上展示“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

翻开广交会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看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进步的轨迹，看到新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冲破西方经济封锁，到60年代、70年代经受“文革”的挫折，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来改革开放的契机，以及新世纪实现腾飞，广交会在中国经济活动史的每一个时期都创造了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所遇到的所有艰难困苦，广交会都经历并昂首走过。困难时期和十年“文革”期间，广交会不仅顶住了种种人为因素的困扰，也经受了物资短缺、展品匮乏的考验，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延续；“非典”时期，广交会不仅如期举行，更以无一例感染的成绩，让世界对我们的应对能力衷心佩服。



包罗万象、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让外商慨叹。（吴伟洪摄）

五十多年一百多届从未间断的历史，不仅是广交会的骄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负重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广交会也是坚持改革的体现。“春江水暖鸭先知”，站在市场的最前沿，广交会顺应改革开放大局的需要，在推动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充分发挥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从以外贸总公司组团参展，到“省市组团、按团设展”，再到“省市组团、商会组馆、馆团结合、行业布展”的改革，使广交会的办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展期设置、摊位管理、展区调整、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广交会都以与时俱进的态度，让“中国第一展”一步步跻身于世界一流展会的行列。

在广交会坚定向前的脚步中，挫折与痛苦、矛盾与冲突交织其中，改革与创新、探索与实践从未停止。众多知名的企业和品牌，从这里孵化成长、享誉世界；一大批外经贸人才，在这所“大学”里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展览行业及其相关产业，也在“广交引擎”的带动下从无到有、根深叶茂。广交会是一座

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是一个展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窗口，也是中国与国际交往的舞台，它在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和启示的同时，也使我们倍加珍惜今天的成果。

而在走过百届荣光之后，广交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开始实现由综合展向综合性和专业性兼具、由单一出口平台向进出口双向交易平台的华丽转身。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此后，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而这期间，也是广交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辉煌时期，由单一的出口变为进出口双向交易，从一届分两期到一馆办三期，专业性不断增强，参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容，办展格局不断扩大，成为展览面积达116万平方米、每届约有21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万采购商到会、成交额超过370亿美元的国际贸易盛会。

广交会展馆的前身是中苏友好大厦，1955年4月4日动工，1957年4月25日至5月25日第一届广交会在这里举行。该馆于60年代末拆建。





经过2003年春季SARS的洗礼，无论是海外采购商还是中国卖家都对网络经济有了要求。同年6月份，“在线广交会”对网站进行了全新改版，覆盖广交会企业商品信息、综合要闻、政策法规、参展流程等多方面内容，提供网上洽谈工具和多种信息检索方式，全球互联网用户可免费查询所有内容。（严亮摄）

作为广交会举办的所在地，广东占尽“近水楼台”之利，更是从中获益良多。十四年来，广东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的1765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915.7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占同期全国外贸总值的26.2%。作为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的重要窗口，广交会无疑为广东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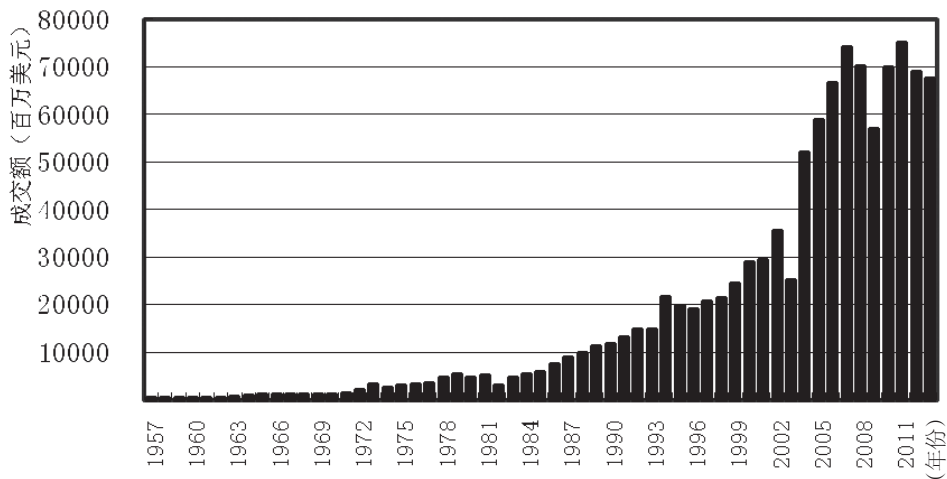
如今的广交会，早已成为世界瞩目的贸易盛会。展馆历经迁址扩建，规模与德国汉诺威、法兰克福及意大利米兰等世界级展览中心齐名，在世界单年展规模上更是独占鳌头。50个展区，涵盖15大类商品，以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采购商。99万户采购商数据库与98家海外工商团体的深入合作，打造出享誉世界的会展品牌。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达到1:13.6，大大领先于世界知名展会的水平。

从2003年春季推出“网上广交会”，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方位的电子

商务服务，到2010年第108届广交会上线运行的客户联络中心，通过中、英、俄、法、西5种语言，提供人工和自动语音应答的全天候服务，再到2013年春季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上线，广交会开始发力电子商务，掘金跨境电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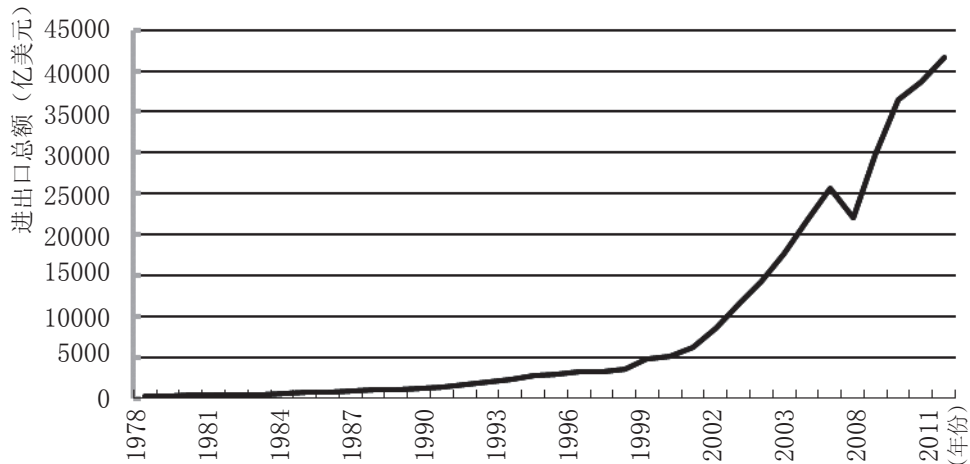
1957—2013年广交会成交额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中国1978—2013年外贸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世界形势在变，广交会也在变。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每年的春秋两季，广交会都如期搭起一个平台，让中国外贸企业与世界市场对话，推动着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与前进。

第二节 广交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 I 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8个月后，当船只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自己故乡的陆地时，“哥德堡 I 号”船头触礁沉没，幸好未有任何伤亡。

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 I 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获利14%。

时光流逝，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哥德堡 I 号”和船上2/3的货物长眠海底，默默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1984年，瑞典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沉睡海底的“哥德堡 I 号”残骸。2006年7月18日，“哥德堡 I 号”的复制木帆船缓缓驶入广州南沙港。这是瑞典商船与广州时隔261年的重逢。

天地悠悠，西洋渺远。像“哥德堡 I 号”这样的悲喜故事不知上演了几万回。当千年后的我们站在港口，远眺烟波浩渺的入海口，回想当年千帆竞逐的盛况时，船上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故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所幸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物和古迹流传，让我们可以凭着史书上的有限记载，通过专家学者的潜心钻研，去努力还原“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茶叶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的踪迹。

而广交会，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种形态的新生与发展。

在会展经济风起云涌的今天，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在羊城举办的广交会，仍是一张最能吸引世界各地客商眼球的中国“名片”。从广交会创办以来很长一



人数众多的巴西采购团举着国旗开路，浩浩荡荡地在琶洲展馆“招摇过市”。
(吴伟洪摄)

段时间里，广交会是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至今仍是我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可以说，世界通过这里发掘商机，中国通过这里走向世界。

同样地，观察广东（以广州为中心）开放海外贸易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地位是非常独特的。与其他省区和贸易港口相比较，有些古代贸易地区和港口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到近现代就一蹶不振了；反之，有些近现代崛起的省区和港口，则在古代历史上默默无闻。唯独南海之滨的广东省，从汉代延续至今天，上下两千年开放海外贸易并持续发展，历久不衰。从文献记载看，广东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唯一的始发地，徐闻大汉三墩港有朝廷要员驻督，广州在唐代即有市舶使，有最早的市舶司，甚至在明代都未被关闭。在清代，广州又具有了“一口通商”的“古代经济特区”优势，号称“天子南库”。这种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对此，中山大学教授黄启臣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国海外贸易史，就刻写在广东（广州）历史发展的记录上。”

因此，作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之所以会落户广州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连接琶洲展馆A、B、C区的天桥上，外宾兴奋地向镜头挥手致意。第104届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并建立“宏观指导、地方组团、行业协调、专业办展”的新型运作机制，分三期举办，总展览面积达111.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约5.5万个，参展企业2.2万家。新展馆、新展期、新机遇正在成就广交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新跨越。（吴伟洪摄）

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全国第一外经贸大省，绝非偶然，而是广东开放海外贸易两千多年的历史必然。

近年来，作为全国第一外经贸大省的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度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双边和多边商业关系不断升级。数据显示，广东—东盟双边商业额，从2005年的369.01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923.65亿美元，占全国的23%，7年增长了1.5倍。东盟超越欧盟成为广东第三大经贸伙伴、第三大投资来源地和第二大投资市场；从2005年至2012年，广东—南亚、广东—中东双边商业额，也从2005年的27.33亿美元和127.43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00.4亿美元和349.06亿美元，7年间分别增长了3.7倍和1.7倍；广东—非洲双边商业额，2000年是55.92亿美元，2012年达到413.87亿美元，12年增长了7.4倍。至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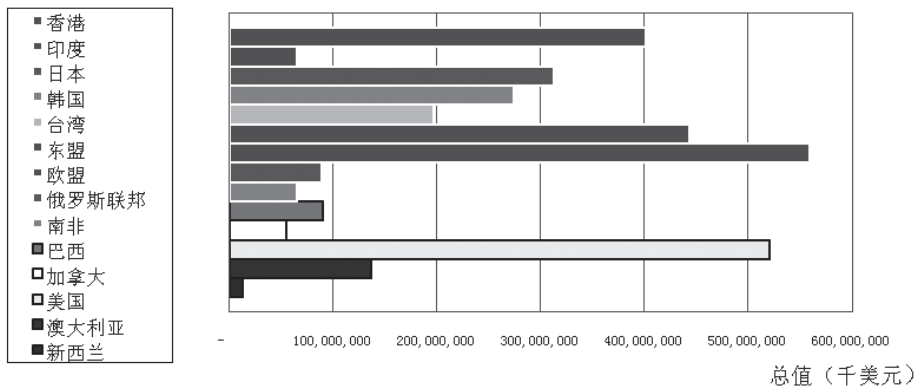
末，广东省在东盟的直接投资已达20亿美元，设立企业近300家。随着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广东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将不断深入，联系纽带也将日益紧密。

而历经30多年的高速发展，广东虽然仍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但已备感后有追兵的压力，增长势头有所放缓，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咄咄逼人。广东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排头兵，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也成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国别

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国家和地区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出口商品类别示意图

2013.12 出口重点商品量值

发布时间: 2014-01-21

金额单位: 亿美元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至当月累计		同比(%)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机电产品	--	-	12655.3	-	7.3
高新技术产品	--	-	6603.3	-	9.8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亿台	18.7	1821.7	2.1	-1.7
服装及衣着附件	--	-	1770.5	-	11.3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	-	1069.4	-	11.7
电话机	亿台	13.0	971.7	14.7	17.1
集成电路	亿个	1426.7	877.0	20.7	64.1
农产品	--	-	671.0	-	7.2
钢材	万吨	6234.0	532.4	11.9	3.4
家具及其零件	--	-	518.3	-	6.2
鞋类	万吨	467.5	507.6	2.2	8.4
液晶显示屏	亿个	32.7	358.6	3.1	-1.1
塑料制品	万吨	696.4	352.9	5.3	11.8
汽车零件	--	-	290.6	-	13.2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首饰	吨	697.7	289.0	-6.5	26.2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	万吨	74.0	286.0	-8.0	-3.5
箱包及类似容器	万吨	302.1	275.9	0.1	9.0
船舶	万艘	307.6	262.5	11.5	-27.3
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	亿个	3515.6	250.6	8.5	2.8
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	--	-	246.6	-	26.2
成品油	万吨	2651.0	245.1	17.5	15.0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	-	216.2	-	8.6
水海产品	万吨	384.0	194.3	4.2	7.2
家用陶瓷器皿	万吨	2541.0	191.6	1.9	14.4

*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包括本表中已列名的有关商品

第二章

统制专营时代下的
初试啼声
(1957—1978年)

广

交

会



【内容提要】

我国传统的外贸体制，是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的环境而建立的统制型外贸体制。这种外贸体制自建立之日起到1978年，并没有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变动（1974年的外贸体制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了一些变动）。当时的特点表现为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国家垄断外贸体制。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是在解放区已经开展的对外贸易的基础上，经过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没收官僚资本，并对民族资本外贸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全面建立起来的。这一变革，就此揭开了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新篇章。

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的国内任务和国际形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内外交流，以求迅速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当时，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给新中国提供了积极支持和援助。但是，美国政府却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刚诞生的新中国采取禁运措施，1951年5月又纠集其他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中国。

广交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

同时，也正是因为它是中国国情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国民经济大环境的制约，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在积极加强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不断突破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过程中，得到较快发展。到广交会诞生之年的1957年，中国已同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对外贸易额得到了

[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1436页。



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外景，1958年第3届至1959年第5届广交会使用。（朱涵摄）

持续的较快增长，并且基本上保持了进出口平衡。1957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1.03亿美元，比1950年的11.35亿美元增长了1.73倍，平均每年递增15.4%。其中，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平均每年递增30.8%，“一五”计划时期平均每年递增9.8%。

在此期间，国家统一管理的以国营外贸企业为经营主体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体系也开始建立。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贸易部，部内设国外贸易司；1952年9月，中央贸易部分为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同时，在中央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的统一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地方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1950年，中央贸易部在该部国外贸易司下设立了经营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口公司，经营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以及中国畜产、

油脂、茶叶、蚕丝、矿产等国营外贸公司。1953年，对外贸易部对原有国营外贸公司进行调整，组成14家专业进出口公司和2家专业运输公司，以后又多次进行调整改组，以改善经营分工。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各地的分支公司。

这些国营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全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逐步统一经营对资本主义市场中重要物资的进出口业务。它们建立伊始，就在对外贸易经营中起主导作用。1950年国营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8.4%，1952年上升到92.8%，占有绝对优势。

1957年，中国国民经济转入单一计划经济轨道，中国对外贸易体制随之适应国家经济体制的要求，形成了由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的国营外贸公司集中经营、国家对外贸公司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统负盈亏、管理和经营趋于一体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

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广交会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基本是专业外贸总公司一统天下。当时的交易会是以外贸部直属各专业总公司为首，交易会的交易团数量和各交易团的名称与当时国家设立的外贸专业公司及其名称基本一致。每次交易会从组团到最后的散场，前后达两个月，摆展时间是两个星期，摆展前总公司都要组织各地的参展公司集中学习一个星期，从待客的礼节到保密事宜再到商品的价格都有详细规定；而在摆展交易的那两个星期，同样也是纪律严明，任何交易员都不能和客商有私下的来往，均要在总公司的安排下，统一意见、统一价格、统一成交。

随后，中国外贸经历了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等，路程坎坷。期间，既有严重的干扰，又有坚决的反干扰斗争；既遭受国内动乱的灾难，又面临国际形势的好转，经历了停滞下降、较快发展、又趋回落这样极不稳定的曲折过程。尽管如此，自1970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还是出现迅速增长，1975年达到147.51亿美元，比1969年的40.29亿美元增长了2.7倍，平均每年递增24.1%。

而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在1957—1978年保持了相对稳定，到后期进行了某些具体调整（1974年对外贸体制做了一些局部性的具体调整），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逐

步强化。实践证明，这种外贸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有利于集中调度资源，发展出口；有利于统一安排进口，保证重点；有利于统一对外，集单力为合力，化劣势为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对付各种挑战。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发展中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同当时这种外贸体制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种外贸体制从逐步形成到60年代末，是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国际条件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和重大缺陷：一是独家经营，不利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国家通过外贸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对外贸易，贸易渠道和经营形式单一，影响了各地方、各生产部门和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了工贸隔离、产销脱节，使生产企业不能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发展优质适销的出口产品，提高对外竞争能力。二是统得过死，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活力。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以及行政包揽和干预，对企业限制过多，忽视经济调节，外贸企业经营自主权很小，难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三是长期以来外贸财务“吃大锅饭”，严重妨碍了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化经营道路，使外贸出口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进口需求过度的倾向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广泛的发展，国内外形势要求中国的对外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迅速扩大。原有外贸体制的缺陷也日益明显和突出，越来越不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外贸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节 出口商品展览会“试水”成功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货物禁运”。

当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0多个，中国对外贸易处在初始阶段，80%的对外贸易是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政府协定、易货记账、进出平衡的方式进行。而单靠这种形式的对外贸易显然不能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多种物资的需要，这就必须寻找一种多创外汇的新途径，以解决从其他国家进口建设急需物资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5年10月至1956年5月，广东省外贸系统凭借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先后举办了三次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凭借广东与港澳和华侨联系密切的优势，在推动外贸发展及其出口创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在此背景下，对外贸易部（以下简称“外贸部”）和广东省有关人士酝酿在广州举办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会。这一建议得到了外贸部的肯定和国务院的重视与支持。

1956年6月12日，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向对外贸易部和广东省委正式呈报了《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请示。请示说，过去许多港澳人士对祖国不了解，甚至抱有怀疑、畏惧的态度，自举办交流会以来，一再回来参观、做买卖，且成交一次比一次多。举办交流会还可以集中全面地介绍出口商品，进一步了解海外市场，对改进我国出口工作有很大的推动意义。

严亦峻的请示得到了外贸部领导的高度重视。部长叶季壮，副部长李哲人、雷任民、孔原等及时作了批示。批示说，部领导“认为在广州举办一个全国性商品展览交流会，邀请港澳及东南亚、西亚各国商人参加，对开展东南亚贸易有很大帮助。最重要的是可以宣传介绍我国出口商品，并借机争取团结海外华商、侨商和东南亚各国商人”，并提出“在广州成立永久性、全国性出口商品样品馆”。

7月21日，外贸部给陶铸省长、严亦峻特派员，各省、市、自治区外贸局，各有关专业总公司发电报，请广东外贸局积极进行筹备。筹备的组织领导以严亦峻同志为主，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鉴于这个展览会是全国规模的，要求各省、市均应参加，并立即进行准备。电报提出，在这次展览会的基础上，在广州建立永久性的全国出口商品陈列馆。

在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充分商议后，8月15日，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向李先念副总理呈报了《请示在广州举办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会》。《请示》在充分阐述举办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会的意义后，对展览会的名称、主办单位、主办名义、展览内容、客商邀请、贸易方式、组织领导、经费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这个请示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经周恩来总理同意，9月6日，国务院向外贸部、外交部等有关部委和上海、天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发出电报，“同意外贸部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共同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会在我国尚属创举，邀请的外国商人很多，这对我国对外贸易、外交和侨务等工作的开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展览会必须办好。但由于目前国内货源紧张，展览会筹备的时间又较仓促，因此在展品征集方面请中央各有关部和省、市人民委员会积极协助、大力支援，使展览会能够如期展出，并收到预期效果。”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市中苏友好大厦胜利举办。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市中苏友好大厦开幕。图为商展会开幕盛况（商展会为广交会前身）。

展览会开幕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祝中国出口产品展览会》的社论。这次展览会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会,展场面积1.8万平方米,陈列商品1.2万多种,全国各外贸专业公司组成13个联合国交易团与应邀到会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2736人次展开贸易洽谈活动,出口成交额为5380万美元。

为期2个月的展览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作为广交会的前身,这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从组织形式、客户邀请接待、展览宣传以及会期选择等方面为后来举办交易会提供了全面的经验。

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成功举办证明,展示与交易相结合,邀请客商当面洽谈,看样成交,是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对外贸易的良好形式,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第二节 广交会对我国对外贸易渠道的影响

经国务院批准,于1957年4月25日至5月25日和10月15日至11月30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在广州举办了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党中央、国务院对广交会十分关心。周恩来总理在广交会刚开幕时就亲临现场视察。他一个展馆一个展馆仔细地察看展出的商品,边走边亲切地对大家说,广交会不单要发展同外国的贸易,还要展览我国工农业新产品,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发展和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当时的广交会《每日动态》都直接报送北京中南海。

当时,我国已基本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提前一年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工农业生产正在逐步恢复和发展,为出口贸易提供了一定的货源。

首届广交会由外贸部直属各专业总公司与各国营及公私合营的外贸公司共同

组成粮油、茶叶、畜产、杂品、丝绸、食品、机械、五金、仪器、运机、矿产、化医等13个交易团。展馆面积9600平方米，分设工业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5个展馆，陈列着我国工农业产品1.09万种。其中包括我国自行研制的解放牌载重汽车、普通车床等，也有各种日用轻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以及传统工艺品。这些产品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丰硕成果。

在这届广交会上，除了外贸企业带有出口计划货单外，吉林、辽宁、贵州、湖南、浙江、江苏、广西、广东8省区27个内贸企业也为广交会带来4268万元计划外贸单（由于成本、包装、质量、运输等原因，实际达成交易87万元）。

老员工钟泳康从1950年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在广东食出工作，至今还为自己参加了第一届广交会而自豪，还保留了一张他们当时在“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前的合影。

说起第一届交易会，老人还记得当年自己摆摊、面对面地和客商交流的场景，他做成的第一单生意是卖给香港安达有限公司几十吨咸鱼。现在回想起来，早期的交易会上主要是农副产品，虽然展馆内展出的都是市面上的产品，但按照规定，猪、鸡、鸭以及塘鱼等鲜活产品都不能进馆。而客商也主要是来自港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从记录来看，首届广交会邀请的对象以港澳和新马地区为主。应邀到会的客商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南非、毛里求斯、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法国、叙利亚，以及香港、澳门等19个国家和地区，共1223人。其中，港澳采购商1021人，占83.48%。

出口成交1754万美元，大部分为现货贸易。其中，工矿产品占36.09%，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占63.91%；港澳占64.33%，亚洲（除港澳外）占25.80%，非洲占0.65%，欧洲占8.75%，其他占0.47%。

延续至今的由广东省和对外贸易部（现商务部）双重领导的广交会组织领导形式在首届广交会上得到确立。首届广交会设工作委员会，由广东省、外贸

部、广州市及其有关单位，各外贸总公司负责人共31人组成。

首届广交会按各交易团成交额收取1%的手续费，除用作承办广交会的所需经费外，剩余部分用于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扩充建馆经费及常经费。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67年。

首届广交会举办了开幕和闭幕酒会，招待前来参会的海外客商。这种开幕、闭幕都举办酒会的做法一直保持到第37届。从第38届起，广交会取消闭幕酒会。为确保大会安全，警卫部队进驻广交会，担负起武装警卫和治安工作。

首届广交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表明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的强烈愿望。

1957年的两届交易会出口成交总额为8687万美元，约占全国当年创收现汇的20%。从此，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为定期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综合性的展销结合的贸易大会，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一条重要渠道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

第三节 经济困难时期货源不断

交易会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一经诞生，就受到全国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也为国际贸易界所认识和接受，并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同时，它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经济大环境的制约而经历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

1956—1962年，交易会经历了第一个起伏发展阶段。1956年冬商展会的举办获得成功，随后两年，又顺利举办四届交易会，规模一届比一届扩大，第4届交易会的出口成交额为1.26亿美元，是第1届1754万美元的7倍多。第4届交易会到会客商3096人次，是第1届1223人次的2.5倍。此外，1958年的交易会还开创了“以进带出”的贸易做法，为把贸易搞活积累了经验。同时，一座比原展馆

面积大一倍多的新展馆于1959年秋季落成，交易会呈现出发展的良好势头。

但是，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可供交易会出口成交的货源不足，1959—1962年连续四年每年出口成交额都在2.7亿美元以下徘徊，4年平均负增长率为0.5%；对客户邀请的数量，也因货源关系而作了控制，每届交易会到会人数均比1958年秋交会少500~600人次。

从第5届广交会（1959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开始，国家提供给广交会成交的货源陷于紧张，加上上年签订的合同，履约率下降，到会客商对此反响强烈。在这届广交会上，开始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并采取措施处理未履约的合同，客商对这种做法反映良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商业信誉。

到第6届广交会开幕前，全国各地便提出了“大力支援出口”的号召，并展开了农副产品收购高潮。有13个省、市、自治区在大会期间提供计划外货单1.7亿元，成交6000多万元。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661位客商应邀到会，比上届略有增加；出口成交1.44亿美元，比上届增长89%。

在第7届广交会（1960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期间，针对国家提供给广交会的货源比较紧张，计划外货单明显减少的情况，大会临时党委采取措施保护货源和生产供货单位的积极性，有25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带来计划外货单，成交1946万元，支持了大会对外成交。这届广交会展出商品2.1万种，其中1000多种是新品种。为展示我国工业成果，第一次展出了红旗牌小轿车。

第11届广交会（196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出口货源十分紧张。当届大宗、传统易销商品如大豆、大米等大大减少，曾试图以工业品和其他商品来替代，但这些商品很多在当时不易推销。另外，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外汇短缺，正加紧采取“奖出限入”的措施，一些国家要求以易货为条件同我国进行贸易，这对完成这届成交任务增加了很多困难。国务院高度重视，先后两次发电报，指示各省市、自治区派得力干部带货单到穗，并转发了各交易团和驻港澳机构的要货单。

在国务院的指示下，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外，22个省、市、自治区均派出干部到会组织、落实计划内货源，有17个省、市、自治区带来了1.3亿人民币的计划外货单，各交易团接受的计划外商品1000万元，可换取外汇约270万美

元。许多省、市、自治区千方百计，尽了很大努力。如北京市提出了7000万元人民币的货单，其中不少是北京市场供应紧张的商品；内蒙古提出的计划外货单中有278万元商品是畅销商品。北京、内蒙古、江苏、黑龙江、山西、青海、甘肃、安徽、湖南、辽宁等省、市、自治区的供货全部是没有条件的。广东、福建等省还根据各交易团提出的要货单补充了190万美元的计划内货单。

各交易团既坚持原则，又灵活经营，有效地促进了成交。这届共出口成交1.17亿美元，超过原定1亿美元的计划；进口成交603万美元。虽然比上年同期减少3.4%，但这在当时已是极不容易。

从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好转的景象。第12届广交会各公司、口岸带来的货单比前几届都多。在会上陈列的2万多种出口商品中，有3000多种是新商品。这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为1.45亿美元，超过历届广交会，比上届增长23.5%。在成交商品中，由于当年农业收成好，农副手工业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例为80：20，上届为45：55。

1963年，可供出口的商品品种和数量显著增加，连续4年交易会的出口成交额大幅度增长。1962年的出口成交额为2.6亿美元，到1966年增加到8.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4.1%。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全国生活用品市场供应出现严重紧张局面的情况下，有关方面仍千方百计保证广交会来宾的基本需要。

1960年，各地凭票证供应的商品达到30多种。作为广交会的举办地，广州市城市居民的粮油和副食品供应亦日益紧张，居民定量很紧。早从1959年4月6日开始，广州市已规定全市居民一律实行凭票购买猪、牛、羊肉和鲜鱼，到翌年6月，除特供外，已完全停止猪肉供应，蔬菜上市量也大为减少。从1960年10月13日开始，广州市再规定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食油由6.25两压缩为4两。到1961年1月1日，城镇居民每人食油供应量进一步压缩到2两。

在全国各地的支持下，广交会有关方面制定了来宾粮油供应管理办法来保证广交会来宾的基本需要。规定外宾、外商、侨商及港澳商人每人每月供应食油1市斤，早餐用面粉9斤。广交会内附设的小卖部所供应外宾、侨胞及港澳同胞的糕点，其需用粮油，按每天定量供应1000件计算；凡经广交会证明招待外

宾、侨商等宴会，每席供应食油2市斤。各省、市交易团每人每月供应面粉10市斤，大米凭粮票供应，食油按每人每月1市斤供应；代表人员一律凭粮票吃饭，广交会指派专人负责办理膳食工作，建立膳食制度，设账登记开膳人数和实际用粮数。大会期间，粮食部门指派专人驻广交会办理代表团粮油供应和管理工作，外宾、侨商和港澳商人的招待单位，由招待单位所在地粮管科指派专人负责检查。各省、市交易代表团必须实报代表人数，招待外宾侨商、港澳商人所使用的粮油，必须专料专用，违者均按虚报冒领粮食论处。

广交会老员工张清华1961年参加广交会工作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回忆道，当时部分粮食要靠进口，但为了赚取外汇，勒紧裤腰带也要出口，外宾的需求也是尽量满足。

“每次广交会开幕前，各大接待采购商的宾馆都提前给出计划并送交外贸部审批。国内老百姓一个月只能享受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鱼的待遇，17级以上的干部才有黄豆等特殊供应，但对外宾没有这样的限制，菜牌上有什么菜都可以点。”

出入广交会和宾馆时，采购商每个人都要将粉红色的鱼尾签戴在胸前。出门坐三轮车时，街上粉红色的鱼尾签随风飘荡，也成了羊城一景。过来人还记得当时的外宾多住在人民路，三轮车上都贴着“来宾优先”的条子。香港、澳门的来宾有时会坐公交车，市民看到他们带着来宾的鱼尾签，都争着给他们让座。

第四节 国民经济复苏 新产品琳琅满目

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出口货源紧缺的困难后，从1962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好转的景象。从1963年起至1965年，广交会展销的商品开始丰富起来。

其中，1963年4月举行的第13届广交会展出的主要商品就有2万多种，丰富

多彩，其中新产品有数千种。机械厅里的新商品占全部展品的一半以上，包括全自动操作的CG1107单轴车床、C136K六角车床，可以移动的混凝土搅拌机，以及塑料挤出机等。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开展改善经营管理活动，许多出口工业品的品质、规格和包装等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进。展出的琳琅满目的农副土特产品，反映出我国农业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辽阔的田野上正在逐步地重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38个国家和地区的2871位客商应邀到会，比上年同期增加318人。其中外商有1185人，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客商都超过历届到会人数。

国内各进出口公司组成的8个交易团与客商进行贸易洽谈，出口成交额出人意料，达到1.4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5%，但尚未恢复到1958年春交会的水平。

第14届广交会（1963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迎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的视察，并获题会名：“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这届广交会有力地显示了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新局面。在这届展会中，展出2万多种商品，包括轻、重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有近1/4即4500多种是首次提供出口的新商品。缝纫机、自行车、闹钟、玩具、钢笔、电风扇等轻工业品，特别引起亚非客商的兴趣；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好转，过去中断或减少出口的农副土特产品，绝大多数恢复了出口；绵羊毛、猪鬃、肠衣、羊绒、羽毛、山羊板皮等畜产品的供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由于我国一贯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因而广交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客商。这届广交会已有42个国家和地区3293位客商应邀到会，除了港澳客商外，外商有674位。尤其是亚非国家来宾与以往相比有显著的变化，除私商外，缅甸、马里、几内亚、印尼、锡兰、尼泊尔、坦噶尼喀、毛里塔利亚等都派了国营企业代表团或国营企业代表到会，缅甸代表团仅两周便成交1700多万美元。

这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为2.0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6%，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到第17届广交会（1965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各交易团展出了2万多种出

口商品，其中有4000多种新商品。由于会前货单准备充足，各交易团成员不再牵挂大宗出口商品的货源是否落实，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扩大出口，把生意做活，多创外汇。茶叶土产交易团首次推出的50种新商品都找到了客户，仅玉米芯粉、黄豆渣等就卖出50万美元；日本、香港商人争相洽购人发，这个品种成交670万美元。各交易团新开发可供出口的商品有100多种。

第18届广交会（1965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举行那一年，国内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农业是1962年以来连续增产的第4个年头，农、牧、副、渔各业兴旺，为出口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届陈列的出口商品，从上届2万多种增加到近3万种，其中新产品增加7000多种。这次展出的粮油食品品种比春交会增加50%；机械产品50%以上是新展品，仪器和工具类产品2/5是新品；轻纺工业品中新花色品种占了1/4。展馆扩大了陈列场地，增加了两层展出面积。这届共组成10个交易团，新增了服装交易团。

这时的海外市场更加疲软，许多地区生产下降，信用紧缩，“奖出限进”。特别是约占我对资出口50%的港澳、新马和日本市场萧条。大会要求进一步贯彻李先念副总理一再倡导的要把生意做活的指示，强调上届广交会运用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届继续应用，同时要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多样的贸易方式拓展市场。这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为4.3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了11.7%。全年春秋两届广交会合计出口成交额为7.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4.93%，是广交会创办以来，成交纪录最高的一届，也是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

第19届广交会（1966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是1957年首届广交会至当届，客商人数最多、地区最广、新客户最多的一届，6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6533人到会。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比往届有显著增加，马斯喀特阿曼、亚丁、塞拉勒窝内等亚非地区的客商第一次到会。缅甸、柬埔寨、锡兰、苏丹、刚果（布）、坦桑尼亚、巴基斯坦、伊拉克、科威特、马尔加什、毛里求斯、墨西哥、加拿大、法国、英国、挪威、丹麦、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了政府贸易代表团、政府官员或国营公司的代表来参加这届广交会。

这届广交会是在我国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出现从未有过的好形势下举办的。展出的近3万种商品中，新品种有4000多种，其中轻工业品的

新品种、新花色比上届成倍增长。我国传统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畜产品、手工艺品等，仍然深受欢迎；五金矿产、轻工、纺织、化工、机械、仪器等商品的成交，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第一次提供出口的电动万能缝纫机、新型闹钟、人造合成纤维纺织物等，引起客商极大的兴趣，并达成了交易。新增了仪器交易团。为方便客商当面洽谈，看样成交，对展品陈列作了适当调整，更加突出了商品的特色。出口成交3.6亿美元，进口成交6039万美元。

第五节 “文革”期间负重前行

从1966年开始，“文革”大潮席卷全国，与外商联系频密的广交会处在风口浪尖。同时，由于广交会接待能力日益捉襟见肘，甚至部分外商不得不在酒店走廊搭床过夜，引发外商投诉风波，又逢敌特炸弹威胁，广交会在风雨飘摇中蹒跚前行。

1966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举行的第20届广交会是“文革”开始后的第1次展会，其时正处在“文革”红卫兵大“串联”阶段，广交会展馆开放，接待国内观众达到最高峰，超过202万人次。在展馆内外所有最突出、最显眼的地方，共悬挂了毛泽东主席画像、照片445幅，不同规格语录牌、标语牌2673幅。大会期间，广交会书刊供应处供应了《毛主席语录》6万多本，包括各种文本的《毛泽东选集》7500多套、毛主席像章23万多枚。

据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副会长、丸红株式会社理事西田健一回忆，在1966年秋天的广交会上，他当时的工作是去交易会会场，在相关的展台里寻找洽谈的机会，可是一连几天都没有得到机会。无意之中他发现那些洽谈的人们，都是先与公司的人一起读毛泽东语录，然后才开始进行贸易谈判。

终于有一天，他等来了洽谈机会。那一天，照例也是从学习毛泽东语录开始。于是，他提出一个建议：“像这样在贸易谈判前学习，我觉得很不错，但



1969年春季第25届广交会起义路展馆。
(广交会供稿)

效率不太高。大家一起学怎么样？”提出之后，他出了一头冷汗，没想到得到对方的赞许。于是他们决定，在广交会开始一个小时前，大家在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前集中学习毛泽东思想。

他在饭店的电梯旁边，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召开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发起人：西田健一。

第二天早晨他去集合地点一看，让人吃惊的是那里聚集了大约100名日本人。首先由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学习会的宗旨，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并指定他当翻译。就这样，继1966年秋天以来，第二年、第三年，连续共计在5届广交会的举办期间，外商们不间断地每天早晨召开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到了第21届广交会举办前夕，正值“文革”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些红卫兵爬上中山纪念堂，要拆下“天下为公”牌匾；把绳索套上孙中山先生像，要拉下这座铜像。“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忙于内斗，殃及交易会馆，广交会情况紧急。毛泽东主席于1967年4月13日亲自批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通知指示：在广交会期间，不组织广交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广交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1967年4月14日晨，周恩来总理感到广交会情况十分紧急，带着毛主席刚刚批复的“五项通知”亲自飞抵广州，连夜召集广州红卫兵两大派系头头开会，耐心说服红卫兵不干扰广交会。

在第21届广交会期间，海外敌对势力派遣特务混在来宾中，企图以合法身份搜集情报、爆破和策反。美蒋特务还运进定时炸弹和五六十磅炸药，把广交会作为他们重点爆破的目标。解放军和公安部门放手发动群众，及时破案，粉碎了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广交会举办百余届，从未发生过爆炸、杀人等重大事故。

1967年8月，“文革”群众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发展成为武斗，广交会商品陈列馆被近千名持有武器的“群众组织”占据，并在门前筑起工事，陈列馆的行政机构基本瘫痪，展馆筹备工作无法进行，影响了第22届广交会的如期举行。1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通知要求：任何组织、任何人员都不得冲击交易会。这届交易会最终推迟1个月，于1967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举行，确保了百届广交会的连续性。虽然这届广交会推迟了1个月，却传出提前闭馆的谣言，扰乱外商参展，广交会组织者历经险阻，终于保证了这届险些中断的广交会如期闭馆。



1964年春季第15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外景。（广交会供稿）

“文革”期间，在“一切都讲政治”的风气下，广交会展出的展品也受到巨大影响。如专门设置毛著馆，并居最高层中间位置；如新开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馆等。有增即有减，早期创汇不少的传统工艺品多次被审查，不合政治要求的就被清扫出馆，导致传统工艺品出口和生产都举步维艰。

从旧文化而来的工艺品首当其冲。1967年春，第21届广交会成立展品审查小组，要求展品突出政治，规定对“四旧”题材工艺品，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以及追求“资产阶级腐朽没落颓废情调”的产品，如奇装异服、“火箭”鞋等一律不展不卖。这届广交会上传统题材的工艺品几乎被赶尽杀绝，展品数量由1966年秋交会的3万种减少至2万多种。

由于会馆对工艺品的审查严格，很多工艺品不能展出，也严重影响了工艺品的生产。据了解，当时很多厂家转行，有500多年历史的烧瓷也停产了。

“文革”对工艺品出口和生产的破坏，一直让周总理很痛心。他多次劝说红卫兵，指示广交会要搞好工艺品出口。1971年6月，周恩来总理做出了“风景图片不能叫‘四旧’，石头刻章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木版水印有销路可以卖”，“我们换回外汇也是间接为革命服务”等指示，当年第30届广交会上就恢复了一部分在“文革”中一度中断的传统工艺品的出口。

工艺品出口与生产逐渐恢复了，但一直依附于轻工业品。1973年秋第34届广交会结束后，周总理指示“工艺品和轻工应分开”。但好景不长，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判“右倾回潮”的影响下，第35届广交会规定“以神魔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为题材的工艺品一律不出口”，“对以古代神话、故事、人物为题材的工艺品，要作具体分析”……工艺品出口再次受限。开幕前，中央“三部一社”（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和新华社）、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对各馆进行审查，规定“孔孟之道的东西不但现在要从展台上撤下来，而且永远也不能卖”。由于工艺品出口受限，这届广交会工艺品出口成交额比上届减少约2000万美元。

受“文革”冲击，在各种政策的影响下，从1967年到1969年，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连续3年停滞、下降。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从第40届广交会开始，广交会的贸易额终于开始大幅度增长。

第六节 中美联合公报引发“中国热”

第31届广交会于197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举行。这届广交会有74个国家和地区的12593位客商到会洽谈。自上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当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西方出现了“中国热”，当届广交会上迎来了首批42位美国商人。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侨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前来参加广交会。

美国绍宾化工公司总经理祖利安·M.绍宾是第一个访华的美商。他说，他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经常看电视，当人们看到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握手时，都“哇”的一声叫起来——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通向中国的大门打开了。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在1972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举行的第32届广交会上，参加的客商比历届都多，有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4598位客商到会，比上届增加了2000多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商到会非常踊跃。第32届广交会接待日商2300多人，比上届增加了300多人。客商多、成交期望大、货源不足是这届广交会的主要矛盾。尽管会前各交易团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落实货源8亿美元，但缺货商品仍达2亿美元。

而在紧接着举行的第33届广交会上，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16734人参加了这届广交会，比上届增加了2000多人。同我国新建交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等国家的客商显著增加；美商逐届增加，这届有156人到会。由于到会客商猛增，国务院不得不规定在广交会期间严格控制全国各地人员到广州，各部委不得在广州召开会议；交易团与会人数和送样品人员也从严掌握。

“文革”期间，广州接待能力极其有限。长期以来，酒店床位短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广交会。客商一度对广州当时的接待条件非常不满，有的生气地将

广交会发的请柬当场撕毁。这一问题引起各届政府的高度关注。

在解决来宾住宿等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作过许多批示，并特事特办，使广州诞生了一批国内领先的酒店、宾馆，建起了当时内地最高的建筑物——广州宾馆，楼高86米、27层。此后，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有关部委批准了“广州外贸工程”立项，拨专款6000万元，包括兴建广交会新展馆、东方宾馆新楼、流花宾馆和白云宾馆，广交会住房紧张的状况大大缓解。可以说，广交会带动了广州酒店业的迅猛发展。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广交会首次按市场规律调高产品定价。

从第32届、第33届广交会开始，广交会狠抓产品定价问题。第33届会展期间，9成以上的商品调高了价格，总体价格水平调高了4成，增加外汇收入3.58亿美元，初步扭转了我国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价格偏低的局面。有外电评论：“中国正运用供求关系的概念，以世界市场能负担的最高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

1972年10月6日至11月25日，李先念副总理对广交会出口商品价格曾5次做指示。在11月25日接见参加广交会的代表时，批评了“成本加利润”的简单作价方法，指出要讲供求关系，根据国际市场行情，该涨就涨、该降就降。

根据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第32届广交会把出口商品价格调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上千种商品价格进行了调整，为国家多收外汇约7000万美元。过去不少商品是一年定一两次价，有的常年不变，一届广交会只卖一个价，“以不变应多变”。这次从实际出发，对不同市场采取了地区差价，基本改变了过去“会前定价，开幕报盘，一成不变，卖完为止”的老做法。

对于此次提价，客商反应不一，新客户、大客户一般表示可以接受；老客户、中小客户认为价格高。有些客商虽然说价格“提得突然”，但仍买了不少货；少数客商减少了订货或没有成交，但走后又来电接受成交。

在第33届会展上，80余种主要商品成交价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比较，基本符合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当届广交会总结报告说：“我们正在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规律做好我们的价格工作。”

但此次调价也暴露出问题：我们对出口商品的价格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心中无数。特别是对没有国际市场价格资料的工艺品、土特产品以及商品的地

区差价、品质差价、原料和成品的差价心中无数。一部分商品调价还有潜力，如花梨木九龙闹钟家具1套10件，内定6万元，实际以26.5万元卖出。

【链接】

传统工艺品的曲折历程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各地“串联”来的数十万红卫兵和学生参观了交易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展出样品及其商标图案，尤其是工艺品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绝大多数是“四旧”题材的迷信品和高级奢侈品，关系到“中国出口商品的方向问题”，要求停止展出这类商品或者关闭陈列馆。

1967年秋交会前，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对工艺交易团的全部展品进行严格审查，要求展品征集应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破大立，新题材的产品应占60%以上。

197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外贸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出口商品的问题，对传统题材的产品能否生产与出口观点不一，使得工艺美术行业约有1/3转业改行，有500年历史的烧瓷也停产转业。

1974年春交会前，外贸部印发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1974年春交会出口工艺品题材的几点精神的文件，规定工艺品出口要能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祖国的新面貌，传统工艺品中以花鸟虫鱼、山水风景为题材的要能反映祖国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凡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工艺品，以及以神佛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为题材的工艺品一律不出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逐步恢复传统题材工艺品的生产和展出。在1978年春交会上，工艺馆内陶瓷展品水平较高，曾被扼杀的传统题材工艺美术品和老艺人的作品重新展出。

尖端科技展品缩小与国际水平差距

1966年的第19届广交会正值我国开始执行第3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出现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此届广交会展出的近3万种商品



在1978年3月举行的第44届广交会上，美国商人在洽谈购买中国的工艺品。（林孙杏摄）

中，新品种就有4000多种。尤其是第一次提供出口的电动万能缝纫机、新型闹钟、人造合成纤维等引起了客商极大的兴趣，并达成交易。另外，由于新产品增多，本届广交会新增了仪器交易团。

随着“文化大革命”浪潮的来袭，1967年第21届广交会展出的出口商品从1965年秋交会的3万种减少到2万多种，但作为展示我国经济建设成就的象征，一些尖端科技产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断涌现，几乎每届广交会都有首次展出的尖端产品。

举例来说，1967年第21届广交会展出合成苯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第22届广交会首次展出标志着我国医疗技术最新成就的人造球形心脏二尖瓣膜的实物和一套临床实行更换手术的照片，机械馆中也展出由上海仪表厂自行设计的精密仪表车床，其加工出来的工件只有世界少数国家可以媲美，同期展出的还有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高分子材料万能试验机、高速自动无司机直流电梯；1969年秋交会，电子仪器展品中新产品达到90%。

1970年的秋交会，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广交会方面与中国科学院组织了47个生产科研单位，同日本技术人员进行了19项技术交流。日本技术人员介

绍了50多种产品，包括采矿、冶金、电子、石油化工、工程机械等方面的制造和使用技术，其中一些项目对我国生产科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4年的春交会，中科院、外贸部进一步组织全国20个部委、省市工人、技术人员117名，与日本、英国、联邦德国3个国家的厂商进行14项技术交流，了解我国在造纸、大型船用螺旋桨制造、自动包装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大事记】

第7届：首次展出红旗牌小轿车

第7届广交会于1960年4月15日至5月15日举行。这届广交会第一次展出了红旗牌小轿车。

第8届：东风12型电子模拟计算机亮相

东风12型电子模拟计算机等一批高级和精密机器、仪器在广交会亮相。

第33届：首次展销大庆原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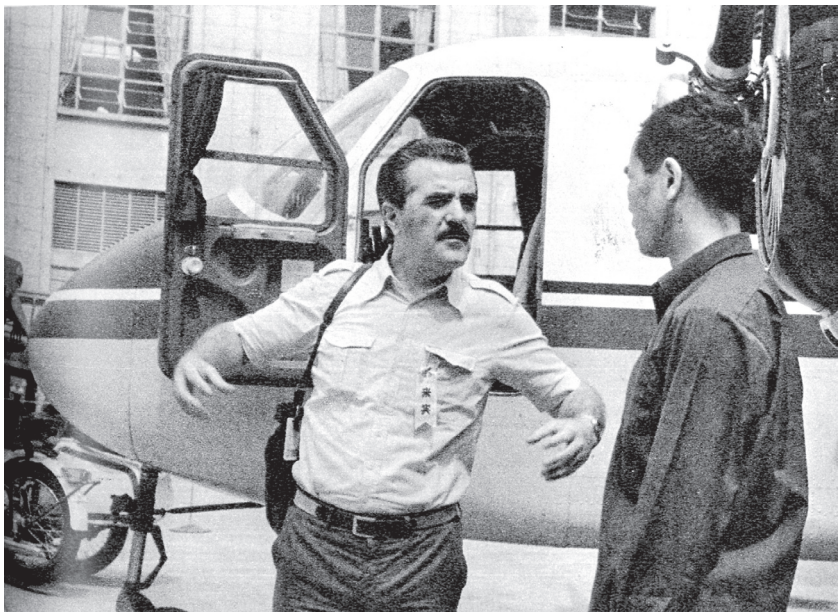
首次展销的有大庆原油、变速自行车等。

第42届：小型电子计算机亮相

展品4万余种，其中新展品有6000多种，如DJS130小型多种用途电子计算机每秒运算50万次，配备有新式的光笔图像显示器；石油新产品有10多种，其中有一种高级汽油，凝固点在零下五六十摄氏度，可供波音飞机使用；人工洗肾机可同时为8个病人洗肾。还有电话遥测心电图机、可视电话、传真电话等。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第一次提供万吨级轮船出口，并接受客户订货。

第45届：展出小型飞机

第45届广交会于1979年举行。小型飞机在会上展出。其中“运—11”小型农业运输机可用于播种、施肥、灭虫，可在5~7米超低空作业，一般土跑道和草地皆可起降。还有一架是可做多种特技科目和夜航训练的“初教—6”型教练机。



在1979年第45届广交会上，这位意大利来宾对展出的飞机产生了兴趣。（林孙杏摄）

第67届：展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第67届广交会于1990年4月15~30日举行，展示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及其系列产品模型，以及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的英汉全自动机器翻译系统“译星”、国内首创的无须开胸便可取到心血管血流参数的检测仪、当时仅有加拿大和我国才能制作的微型中子源反应堆装置，还有通过普通电话线路就可实现各类图像远程发送和接收的多功能视像电话系统、家用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电脑控制的“骨密度仪”和可以进行丰富的知识表演和推理的人工智能机器“知识工程软件环境”等产品。

第71届：展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微机

第71届广交会于1992年4月15~30日举行。这届广交会新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大量推出，成交看好。如电子交易团带来新产品40多种，其中东海486A / 833—C超级微机为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微机之一，每秒钟可执行1500万条指令。



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书系

——篇——星——座——

广 交 公 会

海上丝绸之路的

新生与

发展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编

陈韩晖 吴哲 黄颖川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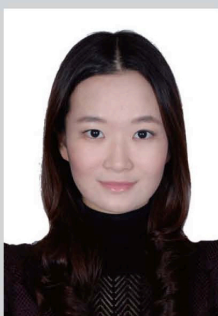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陈韩晖，南方日报主任记者，资深政经记者。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广东省新闻奖等专业奖项20多项。多年经济领域一线采访的积累，重大新闻战役的历练，培养了新闻的敏锐度，紧跟广东经济发展的脉动，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能源产业等领域有一定积淀。曾参与编写《双城会——落实广东目标的新思考》一书。2008年被评为广东省“十佳女新闻工作者”。



吴哲，南方日报记者。2007年7月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随后进入南方日报经济部工作，长期关注外经贸领域。在其职业生涯中，亲历并见证了广东外经贸从鼎盛到艰难转型的全过程，曾参与编写了《冲出风暴眼——金融危机下外经贸大省广东省突围实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其新闻作品先后获得过全国省级党报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党报党刊优秀作品二等奖及“广东新闻奖”一、二等奖等。



黄颖川，南方日报记者。长期关注外经贸领域。从业以来，连续多年报道广交会，采写过大量稿件。跟踪报道了广东抗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见证了中国外贸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新闻作品两次获全国省级党报好新闻一等奖等。



出品人：姚丹林
出版策划：周 晶
责任编辑：易 伦
责任技编：许伟斌
封面设计：友间文化 / 黄新乐

ISBN 978-7-5454-4216-8



9 787545 442168 >

定价：32.00元